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23.05.001

熊辉. 试析《域外小说集》初期的传播困境及成因[J].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2023, 43(5): 1—8.

## 试析《域外小说集》初期的传播困境及成因

熊辉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摘要:**《域外小说集》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享有盛誉,但就是这样一部被今人视为开时代风气之先的译作,其在初期的传播和接受却呈现出惨淡的光景。周氏兄弟作为译者十分重视作品的宣传和流通,赞助者蒋抑卮通过特殊的方式来扩大译作的接受人群,而作者的赠书活动也在无形中推动了译作的传播。即便如此,译作的销量和传播还是十分有限,主要原因在于译者语言的僵硬和译作文体形式的陌生化,译作难以满足当时受众的阅读期待,也与彼时图书市场的发展趋势有关。周氏兄弟在《域外小说集》中所体现出来的超前意识使这部译作成为“将来时代”的经典。

**关键词:**《域外小说集》;翻译文学;文学传播;短篇小说文体

**中图分类号:**I210.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23)05-0001-08

**收稿日期:**2023-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域外思想资源整理与研究(1907—1949)”(21&ZD25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解殖民研究”(19YJA752014)。

**作者简介:**熊辉(1976—),男,四川邻水人,博士,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文学。E-mail:byxiongh@126.com

《域外小说集》是鲁迅和周作人俩兄弟旅居日本东京时期共同翻译出版的系列小说集,首册于1909年2月出版,次册于同年6月出版,后因销路受阻而停止编译计划,编就的第三册也搁浅不印了。尽管发行和传播寂寥,但《域外小说集》可谓周氏兄弟走上文学道路的崭新起点,其对鲁迅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风格的养成具有直接而深刻的启示,甚至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而言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随着中外文学关系的发展和译介学的时兴,从翻译和海外生活体

验的角度来研究鲁迅创作的成果越来越多,《域外小说集》在这样的语境下被塑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虽然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灼灼生辉,但却难以穷尽与之紧密联系的各种话题,围绕《域外小说集》传播的探讨仍可继续深化。

### 一、《域外小说集》的历史价值

学界对《域外小说集》多持正面评价,如这部译作对鲁迅和周作人文学创作的影响,对中国新文学现代性叙事方法和思想精神的输入,以及

在文学翻译史和翻译学上的价值和贡献等。

《域外小说集》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积累了思想和文体资源。周氏兄弟的翻译与清末林纾的翻译不可同日而语,林氏的翻译严格说来并没有脱离传统小说或曰旧小说的窠臼,那些具有欧风美雨的异域风情被他“无情”地归化到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内,所有的异质文化元素均消融于忠孝礼廉的价值观念中,除了让读者领略到故事的精彩和叙事艺术的高超之外,似乎很难对他们固有的生活观念和社会礼仪产生冲击。周氏兄弟的翻译则不然,不仅直译保存了原作较多的语言形式,而且内容上也少有增删,致使外国人的思想观念让中国读者耳目一新。尽管周氏兄弟的翻译因为语言的“复古”而显得“诘屈聱牙”,但其具有十分明显的启蒙色彩:“周氏兄弟把启蒙文学延伸到翻译领域,以翻译作启蒙手段,形成启蒙翻译文学,《域外小说集》正是其产物。这一延伸在情理之中,毕竟,启蒙诉求源自本土文化的某种不足,引入文化体系外要素便于寄寓本土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诉求。”<sup>[1]</sup>

在“别求新声于异邦”的清末,几乎所有外来文学都会带给国人不一样的阅读感受,《域外小说集》给中国社会和新文学输入的“新声”远不止思想上的启蒙,从更长远的文学发展来看,译者的文体试验或许是更为宝贵的遗产。清末以降的翻译小说充斥着整个文坛,而其在叙事方法上还保留了章回体的特点,但《域外小说集》中的作品则多为短篇,这在清末翻译小说中是很少见的。这种陌生化的文体虽暂时不为国人接受,但它在新文学运动中却扮演了“主角”,成为现代白话小说的“新贵”。因此,《域外小说集》有十分重要的文体价值,恰如有学者所言:“《域外小说集》为中国小说的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而中国出现短篇小说是在五四之后,周氏兄弟的筚路蓝缕实在不容小觑。”<sup>[2]</sup>此外,《域外小说集》孕育了五四现代文学的诸多母题,比如《乐人扬珂》《天使》《安乐王子》等儿童文学的翻

译体现出周氏兄弟“对儿童的发现”<sup>[3]</sup>。正是从启蒙思想和输入新文体的角度来讲,《域外小说集》的价值超越了林纾的翻译,成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和新文学的先驱。

对于这样一部有开拓性价值的翻译小说集,学界对它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学价值和现代性影响的挖掘上,对其传播和接受的惨淡状况则没有让人信服的确切论述。

## 二、《域外小说集》的传播

大多数关于《域外小说集》的研究成果属于翻译文学接受的范畴,而从翻译文学传播的角度来讲,该译作缘何销售有限,是因为译者缺乏营销的策略吗?实际上,这部译作的传播情况并非如表面看来那么黯然。

从《域外小说集》出版第一册开始,鲁迅就比较重视译作的传播,设法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加以推销。鲁迅有为图书发行写广告词的经历和经验,并且成效显著。1906年7月,鲁迅和顾琅合作撰写的《中国矿产志》在日本井木活版所印刷,由上海普及书局发行。鲁迅为这部作品写的《本书征求资料广告》,刊登在1907年2月出版的修订本《中国矿产志》的封三上,末尾写道:“如蒙赐书,请寄至上海三马路昼锦里本书发行所普及书局,不胜企盼之至。”<sup>[4]</sup>作者和发行商希望图书大卖的心情由此可见。这本带有科普性质的作品出版不到一年就再版了三次,而且被列入中学生的学习参考书目,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究其原因,主要与本书科普性的内容及被列为中学生的参考书有关,鲁迅所撰写的征订广告也或多或少地发挥了宣传作用<sup>[5]</sup>。正是认识到文字广告的宣传对作品传播的作用,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出版后就积极投入到宣传工作中。1909年4月17日,上海的媒体《时报》刊登了鲁迅本人写的售卖译作的广告词:“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竞先选译,裴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译辞以求其达。”<sup>[6]</sup>

第二天,即4月18日,这则广告词又刊发在《神州日报》上,内容没有做任何改动<sup>[7]</sup>。为引发读者的兴趣,鲁迅从选材、译语到故事的新颖度等方面均对译作进行了正面介绍和描述。鲁迅前后两天在大上海的两家媒体上发表关于《域外小说集》的消息,而且是刊登在《时报》和《神州日报》头版的显耀位置,其力图借助媒体宣传扩大译作影响,从而助推营销之目的昭然若揭,但鲁迅撰写的广告词“内容中规中矩,跟彼时喜欢夸大其辞的宣传文案相比,学术气有余而灵气不足,缺少出奇撩人之处,自然很难引起读者注意”<sup>[8]</sup><sup>20</sup>。因此,《域外小说集》虽然在两家重要报纸的头版上宣传了,但因为鲁迅的文风“老实”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终归是没能给译作的销量打开门路。

鲁迅不仅自己撰写《域外小说集》的介绍文字在上海知名报纸上宣传译作,还策划了其他宣传方式,目的就是要扩大译作的影响和销量。目前发现的最早介绍《域外小说集》的文字是1909年4月17日刊登在《神州日报》上的“赠书志谢”：“会稽周子树人研精文学,欧美近世名著,籀读有年。乃与其弟作人有《域外小说集》之刻。译笔雅健,无削趾适履之嫌。凡所采录,必皆文海之新流,欧西文豪之宏著,声价之高,盖可知矣。昨承赠阅,特志谢于此。”<sup>[9]</sup> 这篇文章估计出自朋友之手,毕竟关系不好的人不会成为受赠者,因此对此译作多有褒扬。友朋之间赠书本是私人事件,何故要将感谢的话刊登在报纸上呢?或许赠书人和受赠者对这则私人的答谢辞怀着特别的用心,变相地策划了一次广告宣传;又或者是受赠者“为帮扶友人宣传而有意为之”,属于朋友仗义的宣传行为。

赞助人蒋抑卮的慷慨解囊,保证了《域外小说集》的按时出版。从勒菲弗尔的翻译文化视角出发,我们会关注“赞助人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尤其是译作的出资人。《域外小说集》的顺利出版,离不开鲁迅的浙江同乡蒋抑卮的倾囊相助。蒋抑卮是浙江杭州人,银行家兼实业家,

1902年留学日本,后因患耳疾回国,1909年复赴日本治疗耳病。鲁迅和蒋抑卮关系较好,曾向他谈起翻译小说的打算,后者表示极力支持。根据鲁迅弟弟周建人的回忆,哥哥的译书生涯“很惨淡”：“《域外小说集》的印刷费用,由在日本的同乡蒋抑卮代垫了一百五十元,出书后并在上海蒋家开设的广兴隆绸缎庄帮助代售。”<sup>[10]</sup> 基于翻译赞助人的身份,也是出于便捷考虑,我们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域外小说集》在上海会选择了一个稠庄而不是书店作为销售点,因为稠庄就是赞助人蒋抑卮的店铺,经营管理起来比较方便。鲁迅到仙台之后,曾于1904年10月8日给同乡蒋抑卮写了封长信,告知对方自己在仙台的学习生活情况,并且将内心的想法也和盘托出<sup>[11]</sup>。由此可见鲁迅和蒋抑卮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好后者再度访问东京的时候,碰上前者在翻译外国的小说,作为实业家和银行家,出钱资助周氏兄弟出版译作也算是成人之美的善举。作为赞助人,蒋抑卮对《域外小说集》的传播做过两件事:一是他将自己在上海开设的稠庄作为译作的代售点,以实体店的方式售卖周氏兄弟的译作;二是采取赠送的方式分发给读者,据知情人士描述:“蒋抑卮从日本回国后,也曾托浙江省立图书馆大批对外赠送,并在卷首的空白页上盖有印章:‘浙江省立图书馆辅导组代绍兴蒋抑卮先生捐赠’。”<sup>[12]</sup><sup>27</sup> 这两件事主观上都是为了推广周氏兄弟的译作,只是单凭以一个稠庄为据点的售卖力实在有限,导致《域外小说集》在上海只卖出20余册。也许售卖的图书还赶不上蒋抑卮赠送出去的数量,毕竟后者是依托浙江省立图书馆发起的活动。在此,有必要对蒋抑卮的赠书活动作详细的探讨,因为这对译作的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蒋抑卮要请浙江省立图书馆来办理赠书一事,而不是自己操办呢?这也许与他作为生意人不谙文坛琐事有关,如果有很多书需要赠送,哪些人或哪些单位是最合适的受赠人?估计蒋抑卮摸不清其中的行道,因此委托有这方面经验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代办,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选择浙江省立图书馆来处理译作的赠送,那赠送的数量一定不会太少——虽然我们今天还不清楚具体的数量,否则何须劳烦一个机构来办理呢?

赞助人蒋抑卮的经济地位最大限度地扩大了《域外小说集》的传播。浙江省立图书馆代办的捐赠图书是以蒋抑卮而非鲁迅或周作人的身份来完成的,这表明前者对所捐赠之书具备所有权,倘若仅仅是作为代售点的负责人来处理此事,那他是没有权利以自己的身份来发起这场赠书活动的。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受赠人收到《域外小说集》时多半会以为这书是蒋抑卮买下来赠送给他们的,似乎与译者鲁迅没有任何关系。蒋抑卮捐赠出去的这批图书不属于《域外小说集》在国内的销售额,因为鲁迅知道上海只卖出去了 20 余册,证明不是蒋抑卮买下来后再转手送出去的。如此一来倒产生了另一个疑问,那便是蒋抑卮是如何拥有这批书的所有权的? 这估计与周建人所说的蒋抑卮“代垫”150 大洋的印刷费有关,既然是“代垫”,那就一定是要回本的;而既然自己出资印刷的译作卖不出去,回本也就无望,那就只能以现成的“商品”来作为抵押。如此一来,蒋抑卮便拥有了这批积压图书的所有权,毕竟他是幕后的“操盘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蒋抑卮作为《域外小说集》的实际赞助人,在译作销售极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经济地位最大限度地扩大了译作的传播。试想,如果蒋抑卮本人经济状况不好,他会支持《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吗? 这部译作还能这么及时地与读者见面吗? 即便是没有他的资助该译作也能顺利出版,那在销售不畅的情况下,他会买下大批积压的图书赠送给读者吗? 如果没有蒋抑卮慷慨解囊转赠图书,那《域外小说集》还能流通到这么多人的手上吗? 所以,蒋抑卮的经济地位推动了译作的传播,让更多的人人在“被动”但欣喜的情况下读到了开时代风气之先的《域外小说集》。

目前鲁迅研究者和翻译研究者均根据鲁迅在 1921 年上海群益书社再版《域外小说集》时所

写的序言之记载<sup>①</sup>,断定该译作的传播是失败的<sup>②</sup>。但也有学者认为,单凭鲁迅所说的卖出去了 40 多本译作来推断其传播的失败,似乎有失公允,因为除了公开销售之外,还存在复杂的“隐形传播”:第一,周氏兄弟的赠书带动的传播,从鲁迅和周作人的日记中统计发现,自 1912 年至 1917 年间,他们共计赠送了 70 本译作,数量比市面销售的要多;第二是周氏兄弟的自我传播,即周氏兄弟在翻译了外国的小说后,会在自己的书信、日记、创作文章和研究文章中不断介绍、引用、模仿或举证译作中的内容,从而带动译作的传播<sup>[13]</sup>。该研究对我们重新认识《域外小说集》的传播提供了新思路,也确实证明译作实际的传播效果比表面上要好很多,但对自我传播的认识却会模糊译作的影响和传播的界限,错误地将译作的影响视为译作的传播。关于《域外小说集》的传播不能仅仅根据销量来考量的看法,早在 1981 年戈宝权就已提出并进行了讨论:“尽管《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和销量遭到厄运,东京和上海卖出去的只有四十多本左右,但实际上还不止此数。如鲁迅本人赠送过友人……”<sup>[12]27</sup>此外,《域外小说集》的隐形传播当然还应包括数量不菲的蒋抑卮邮寄赠送的部分。

尽管各方努力宣传《域外小说集》,但收效甚微。不管怎么说,根据《域外小说集》的销售数量来推断其翻译和传播的失败,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只是真实的传播接受情况似乎比只看销售的表象略微让人欣慰而已。而今人也只是站

① 鲁迅回忆说:“半年过去了,现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至于上海,是至今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参见鲁迅《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 1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6 页。

② 寥七一认为:“从翻译和接受的角度看,《域外小说集》没有达到周氏兄弟预期的目标,因而是失败的,这从销售的数量就可以肯定。”参见寥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2 页。

在新文学的立场上才对它大加褒扬,在宣统年间,这部译作几乎处于无人问津的沉寂状态。

### 三、《域外小说集》传播受阻的原因

《域外小说集》在彼时遭到的“冷遇”与事后赢得的“吹捧”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恰好映衬出这部翻译文学作品超前的价值,同时折射出周氏兄弟作为译者的独到选材眼光。对于这样一部有价值的翻译小说集来说,为什么在诞生之初会被国人忽视呢?

文言翻译直接导致《域外小说集》的读者群体减少,译作的销量自然十分有限。周氏兄弟在翻译《域外小说集》时,采用的是被士大夫所认可的文言文,表明他们翻译时的潜在读者是知识分子阶层,其翻译的目的也不是要给中国输入通俗文学读物,相反是希望获得知识阶层认可的雅致之作。倘若他们完全出于市场考虑,则肯定会采用通俗的白话文,翻译故事性和通俗性俱佳的作品。关于鲁迅和周作人译文古奥而不得普通读者赏识的看法,蔡元培曾阐发过类似的言论:“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sup>[14]</sup>知识层次不高的人尚且不能理解周氏兄弟的翻译,那对广大的普通人而言,阅读和理解《域外小说集》更是望尘莫及了。将译作的潜在读者限定在知识分子阶层,本来就拒绝了大部分普通读者,再加上五四以来文言文的地位江河日下,所有以文言创作和翻译的作品注定会被历史淘汰。不得不说,鲁迅翻译的语言策略是失败的,它至少导致了读者的大量流失,译作传播受阻,恰如胡适所说:“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够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sup>[15]</sup><sup>24</sup>胡适认识到采用古文会导致“不能行远,不能普及”的负面后果,为了阐述古文的不足,他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专门以鲁迅和周作人翻译《域外小说集》为例,来说明采用古文翻译是不会赢得读者的失败行为:“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功夫既是很高的,又都

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的小说也确实高得多。……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sup>[15]</sup><sup>24-25</sup>1920年3月,《域外小说集》准备再版时,鲁迅在再版序言中也承认译文存在很大的语言问题,不仅是胡适所说的采用了死的文字,而且是字词与句子生硬,确实配不上重印。但从选材的角度来看,鲁迅觉得其中有几篇小说还是值得再版的,只是为了有更多的读者,必须改用白话文译之:“其中许多篇,也还值得译成白话,教它尤其通行。”<sup>[16]</sup><sup>177</sup>

翻译语言会将读者拒之千里,但这应该不是周氏兄弟译作受阻的主要原因,不然同样采用古文翻译的林纾译作为什么能广受欢迎呢?鲁迅和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文体形式上也不能满足受众的阅读期待,从而导致读者寥寥的惨淡局面。这部翻译作品集收录的主要是短篇小说和童话,与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相比,其短小的容量导致故事的曲折性和吸引力大打折扣,读者对之感到索然无味。也即是说,鲁迅翻译的短篇小说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读者根本不接受这样的文体,他自己对译文遭到读者“嫌弃”的个中因由也有敏锐的发现:“《域外小说集》初出的时候,见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头,却已完了!’那时短篇小说还很少,读书人看惯了一二百回的章回体,所以短篇便等于无物。现在已不是那时候,不必虑了。”<sup>[16]</sup><sup>178</sup>鲁迅的话一方面道出了当年《域外小说集》不受欢迎的原因,是短篇小说文体的陌生化所致,另一方面也点明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短篇小说的命运在新文学界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因此他相信《域外小说集》在五四以后再版的话,定能摆脱清末时期仅销售几十册的尴尬局面,这使1921年《域外小说集》在上海群益书社再版显得更为必要。当我们就此断言《域外小说集》是因

为语言和文体形式超出了中国普通读者的接受范围从而导致认可度不高的话,这是否表明中国古代没有短篇小说?倘若中国古代有短篇小说,那鲁迅翻译的短篇小说与之又有什么不同,方才导致译作与读者产生疏离感呢?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短篇小说“实际上大多是长篇小说的‘压缩本’,是一个原原本本、有始有终的故事的浓缩。西方短篇小说早期也是作为长篇小说的浓缩形式出现的。19世纪以后,西方短篇小说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不再追求完整的故事情节,常常截取一个横断面、一个片断来反映生活,着重表现作家在生活中获得的某种印象或者感受。……所以它们不可能迅速地为近代中国人所接受”<sup>[17]</sup>。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翻译的西方短篇小说文体形式不仅逐渐被中国读者接受,而且影响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方式,逐渐演变成新文学自身传统的构成因子,成为今天中国读者熟悉且认同的文体。

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分析《域外小说集》传播的不足,是自蔡元培和胡适以来甚至包括鲁迅在内的学界主流观点,但这是否是该译作传播不力的主要原因呢?《域外小说集》不受欢迎与当时中国读者不喜欢阅读其中的作品有关,受清末流行小说译介潮流的影响,更能满足人们阅读期待的是俄罗斯虚无党革命文学。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两卷共计收入作品16篇,从国别的角度统计:俄罗斯7篇,波兰3篇,波思尼亚2篇,英国、美国、法国和芬兰各1篇。从中可以看出,除英美法三国之外,这部译作在选材上基本锁定的是东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因为“在周氏兄弟眼里,俄国人民当时正受着帝国主义的压迫,其劳苦人民的生活境况与当时晚清的人民相似。大部分的俄苏文学作品揭露了俄国封建农奴制度,对‘小人物’怀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情,对统治阶级非常不满”<sup>[18]</sup>。1921年初,上海群益书社出版的《域外小说集》的篇目增至37篇,包括俄罗斯的18篇,法国的6篇,波兰的4篇,希腊的3篇,英国、美

国及芬兰各1篇。从选材上看,基本延续了《域外小说集》初版时的思路,除俄罗斯文学独占鳌头之外,东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仍是译介的重点,作为强势民族的法国文学增加了5篇。

日本最早介绍《域外小说集》的是1909年5月1日发表在《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的一段话:“在日本,欧洲小说的销量很好,在日本的中国人自然也受到影响。居住在东京的周氏兄弟虽说只有二十五六岁,但在青年人里算是喜爱读书的。他们阅读英、德译本的西方作品,并计划将只值30文钱的《域外小说集》收集编译后寄回中国。目前他们已用汉语译完第一集。清朝留学生通常喜欢阅读俄国革命的乌托邦作品,另外还有德国、波兰等国家的作品,而不是特别喜好专门阅读法国作品。”<sup>[19]</sup>这段文字赞扬鲁迅和周作人是留学生中少有的喜欢读书的青年人,同时也指出当时中国留学生喜欢阅读的外国文学作品是俄罗斯革命的乌托邦小说,还有就是德国和波兰的作品,而对法国文学不感兴趣。这段话是在《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之后写的,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部译作销路如何,但此文的最后一句话似乎预感到了这部译作失败的命运。周氏兄弟在译作的第一册中收录了7篇作品,除英国和波兰各1篇之外,其余5篇均为俄罗斯作品,占了近72%的比重,看起来倒是符合当时中国读者对俄罗斯文学的偏好。但这5篇作品却不是俄国革命小说,鲁迅所译的两篇均为安德莱夫的作品,是受了当时日本文坛“安德莱夫热”的影响而译,原本不是出于受众的考虑,而且安德莱夫是“神秘派和颓废派的作家”<sup>[20]</sup>,并非宣扬社会乌托邦的革命作家。因此,《域外小说集》因不符合当时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期待而被“拒之门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域外小说集》的销售和传播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固然与译本在语言和文体上的特殊性有关,也受制于当时翻译文学的接受语境。在译作出版之初,鲁迅也是想方设法宣传自己的作品,但市场效应远远低于他的预期,国内20余册

的销量反映出惨淡的传播状况。专事清末小说研究的阿英在分析《域外小说集》在宣统年间遭到冷遇的原因时,主要认为译作语言不但采用古文而且保留了原作的语言风格,在文体上也与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大相径庭等,这些因素导致了译作没有引起社会反响。与此同时,他也提到了发行对译作传播的干扰:“问题是,周氏弟兄理想不能适合于当时多数读者的要求,不能为他们所理解,加以发行种种关系,遂不能为读者所注意。”<sup>[21]258</sup>译作的“发行”自然涉及市场营销,有学者从商品流通的角度分析该译作销售失败的原因,认为有四大难以突破的市场营销瓶颈:首先是广告写得比较平实,不足以吊人胃口,自然难以吸引读者;第二是销售点太少,只有“广昌隆稠庄”一处代售,而且还不是专门的书店,不像其他作品有专门的营销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销售点;第三是周氏兄弟在文坛没有名气,缺乏名家名译的“吸粉”能力;第四是图书市场的商机萎缩,宣统初年的图书市场已趋于饱和,没有绝对优势的作品或无名小卒的作品均难以出售<sup>[8]20-21</sup>。“晚清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一个最繁荣的时代。所产生的小说,究竟有多少种,始终没有很精确的统计。……实则当时成册的小说,就著者所知,至少在一千种上。”<sup>[21]</sup>面对如此繁荣的小说创作现状,初出茅庐的周氏兄弟想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领地,无异于虎口夺食般艰难。身在东京的鲁迅和周作人,根本无力左右国内图书市场的格局,加上译作自身存在语言和文体的“陌生化”效果,注定了《域外小说集》惨淡的销售和传播结局。

百年之后,当我们回头重新打量这部命运多舛的翻译小说集时,在感叹时代和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具有强大干涉力的同时,也不得不为鲁迅当年的翻译选材表示钦佩。《域外小说集》传播的沉浮经历是中华民族对外交流活动的缩影,人们今天重新赋予这部译作崇高的地位和历史价值,说明了跨文化交流和传播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彭勇穗.《域外小说集》:复古作启蒙[J].文学评论,2020(6):201—211.
- [2] 赵亮.《域外小说集》:中国现代小说的先声[J].鲁迅研究月刊,2017(10):59—65.
- [3] 侯桂新.《域外小说集》与周氏兄弟“儿童的发现”[J].东岳论丛,2022(1):58—64.
- [4] 鲁迅.《中国矿产志》征求资料广告[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54.
- [5] 谢仁敏.新发现《域外小说集》最早的赠书文告一则[J].鲁迅研究月刊,2009(11):80—81.
- [6] 周树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N].时报,1909-04-17.
- [7] 周树人.《域外小说集》第一册[N].神州日报,1909-04-18.
- [8] 谢仁敏.《域外小说集》初版营销失败原因新探[J].鲁迅研究月刊,2014(9):19—22.
- [9] 赠书志谢[N].神州日报,1909-04-17.
- [10] 周建人.大哥归国[C]//西北大学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年刊.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12.
- [11] 鲁迅.致蒋抑卮[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29—330.
- [12] 戈宝权.鲁迅和《域外小说集》[J].世界文学,1981(4):23—31.
- [13] 王祖华.《域外小说集》的隐性传播[J].东方翻译,2015(5):16—21+34.
- [14] 蔡元培.答林君琴南函[C]//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141.
- [15]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M].上海:申报馆,1924.
- [16]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M]//鲁迅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7] 袁狄涌.《域外小说集》:成功与失败[J].贵州文史丛刊,1993(5):32—36.
- [18] 叶依群.《域外小说集》的生成与接受[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97.
- [19] 编辑.“文艺杂事”[J].日本及日本人,1909(508).
- [20] 周作人.安德莱夫《齿疼》译后记[M]//点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1920:180.
- [21] 阿英.晚清小说史[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

## The Poor Dissemination of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in the Initial Stage and Its Causes

XIONG Hu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5)

**Abstract:**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enjoys a high reputa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ry translation. However, this translated collection, which was regarded as the pioneer of the times by modern people, had a bleak prospect of its early dissemination and acceptance. Zhou Shuren and Zhou Zuoren, as translators, ha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publicity and circulation of their translated work; the sponsor Jiang Yizhi had attempted to expand its acceptance through a special way; the author's presenting books as gifts had also promoted its dissemination invisibly. In spite of all this, there were still very limited sales and dissemination. The main reason might lie in the inflexibility of the translator's language and the defamiliarization of the style of the translated work. It was also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book market at that time. Consequently, the translated work was difficult to meet the then audience's reading expectations. The Zhou Brothers' great foresight reflected in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made this translated work a classic of the "future era".

**Key words:** *A Collection of Foreign Novels*; translated literature; literary dissemination; style of a short story

(责任编辑 吴艳玲)

###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3年重点选题方向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2.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3.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研究
4. 枫桥经验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5. 数字经济与产业升级研究
6. 越地文化名人及其思想研究
7. 阳明心学与浙中学派研究
8. “浙东唐诗之路”研究
9.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科学)2023年重点选题方向

1. 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建设研究
2. 教育发展与共同富裕问题研究
3. 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
4. “四新”学科及专业建设研究
5. 越地教育家思想研究